

港中大版序

一

今年(202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學之理念》是一擴大版，它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大學之理念》及《再思大學之道》二書的上下合卷本，這也應是我論大學二書的最後版本。

本書上卷《大學之理念》最早問世是1983年，由台灣的中國時報社出版，不數年，已有十二刷之多。此後，在香港(2000年牛津大學出版)、大陸(2001年北京三聯出版)都有增訂版，長年來，在兩岸三地風行不絕。它在華文世界中受讀書界之歡迎程度幾可與我三本散文集(《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比勝。《大學之理念》所討論的就是「什麼是大學」的問題，也是「大學之為大學」的問題，它包括大學之理念、性格；大學之世界精神、大學之現代性，大學在發展知識與培育人才的作用；大學在型塑、改造與推動社會進步的角色。當然，此書亦論及學術自由、學術獨立與學術倫理的真意義，以及人文教育在科學居主位的現代大

學中的位序等。不誇大地說，《大學之理念》是百年來，自蔡元培先生以還，鮮少系統地以中文論大學之為大學之書。

本書下卷《再思大學之道》一書是我2004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一系列講演的論集。自2005年起，我多了許多自由的時間，便接受邀請，十年中，先後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江西師範大學、高雄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深圳讀書論壇做專題演講。這八次演講，經我修改、補充後便成了這本2017年出版的《再思大學之道：大學與中國的現代文明》。此書承接上卷《大學之理念》的理路，強調地指出中國的「現代大學」的誕生（以蔡元培改革北大為代表）完成了中國二千年學術思想之變，即由經學轉向科學（參觀拙著《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香港：中華書局，2020）。中國的現代大學以「科學」為知識之核心，它與漢代以來兩千年的「太學」以「經學」為知識之核心者迥然不同。誠然，科學使中國進入現代，科學也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根源動力，同時，科學也必然是建構中國現代性（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源頭活水。事實上，中國的大學與世界先進國家的現代大學一樣，無不以「科學」作為知識之標竿，馴致出現社會學者貝拉（Robert Bellah）所說的「知識的科學範式」（scientific paradigm of knowledge），即科學成為一切知識之尺度。正因為科學在大學中處於當陽稱尊的地位，「知性之知」的科學知識得到了充足的發展，而講「德性之知」的道德教育和價值教育則被邊緣化，甚至失位了。這就出現了我所說的「大學之道」的「易位」現象。古之「大學之道」是：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而今之「大學之道」則是：

在明明理（科學之理），在新知（科學之知），在止於至真。

中國古代的「太學」以經學為核心，經學（四書五經）最終追求之鵠的是「至善」，而今天大學以科學為核心，最終追求之鵠的是「至真」。但是，我們如要以大學是建造中國現代文明的知識基地，則大學之道在求「真」外，還必須求「善」與求「美」。基本上，知識的屬性是三維的，「知性之知」是科學，「德性之知」是倫理學，「審美之知」則是美學。因此，我在《再思大學之道》一書中，一再強調，大學作為一知識的殿堂，則其創新的知識，必須是真、善、美的三維知識，而大學作為一教育的重鎮，則必須在「知性之知」的知識傳授外，還需在倫理（價值）教育與審美教育上有所用心。這是我所以主張古今「大學之道」必須兼有並舉。

二

說起來不免有些偶然和緣分，我第一次有「大學為何物？」之問，是1975年我到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顯然我為劍橋的古典趣味和現代精神的美妙結合所觸動（事實上，我在劍橋寫了《劍橋語絲》，第一本散文集），當我知道天清地寧的劍橋七百多年來，除培育了一連串燭照千古的詩人和哲人，還曾出過牛頓（Isaac Newton）、達爾文（Charles Darwin）、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學）、凱因斯（John Keynes，經濟科學）以及發現DNA的沃森（J. D.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等影響全世界的科學巨擘，我不由得對

劍橋之為一間「大學」產生興趣與好奇。於是，我在劍大的圖書館暢讀百年來論「大學之為大學」的名著，也可說是，進入了「知識社會學」的一個探索。十九世紀的牛津學者紐曼(John Newman)的《大學之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把大學定性為一個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養紳士的地方，他心目中的紳士是指通達而有修養與識見的文化人。這一教育理想影響英國教育甚巨，亦是美國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源泉。

在這裏，我要指出，我書中所講的大學是源自西方歐洲的產物，西方大學的源頭不始於希臘，而是始於中古基督教世界的羅馬。源自羅馬的西方中古大學，一直都以《聖經》為知識的核心，此與中國漢代以來的「太學」(傳統中國的最高學府)以「四書五經」為知識的核心是有極高的比擬性的。但有八百年歷史的歐美大學在十九世紀末的德國柏林大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及阿爾托夫(Friedrich Althoff)等人的大力革新下，柏林大學首先擺脫了歐洲中古的學術傳統，神學(《聖經》)退出大學，科學則進居於大學殿堂的主位。他們標舉的大學的「新理念」是以大學為「研究中心」，教授的首要任務是自由地從事於「創造性的學問」。簡言之，德國大學的新理念與紐曼所懷抱的理念判然有別。紐曼所重者是「傳授」知識，德國大學所重者則是「創新知識」。

德國大學的新理念，在美國受到著名學者佛蘭斯納(Abraham Flexner)的讚揚；他的《大學》(*Universities*)一書，第一個把德國的大學定性為「現代大學」(modern university)，他肯定「研究」是現代大學的重要使命，肯定發展和創新知

識是現代大學的重大功能，同時，他也賦予「教學」（教育）與「研究」同等的地位。佛蘭斯納是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的創建者，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應他的邀請成為第一個參加研究院的學者。寫到這裏，我必須提到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二十世紀初留學德國，正遇到德國大學的革新，回國後，他把德國的大學新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並在中國建立起中國的現代大學的新範典。蔡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長演說中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又在北大一次開學儀式中說「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證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這些話已充分地表達了德國新大學的新理念。事實上，1912年蔡先生在中華民國政府擔任教育總長時頒發的《大學令》，就宣佈廢除「經學科」（但不是經學），完成了從「經學」到「科學」的學科現代化的歷史大業。1917年，蔡先生主持北京大學時，傳統的經學如詩經、易經、春秋都分屬到「文科」的各個學系，而科學則全面進入大學，成為大學的核心的知識體系。的確，蔡元培先生對中國的大學的變革，實不少遜於洪堡德與阿爾托夫對德國的大學所做的革新。正因為是蔡先生，中國的大學雖是德國橫向的移植而來，但中國的「現代大學」之出現時間卻是與英、美同步的。蔡先生之功大矣！此所以我的論大學兩書對蔡元培先生都有專篇論述。

三

當我讀到克爾（Clark Kerr）的《大學之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1963）時，眼睛為之一亮，克爾指出佛蘭斯納

的「現代大學」已演變為他所稱的 *multiversity* (綜合大學)。*Multiversity* 的結構主體有二，一是大學之本科生部，那是從英國借取過來的，也即是紐曼所講的傳統大學的本體；二是大學的研究生部，即是從德國借取過來的，也即是大學的「研究院」。前者的中心任務是「教育」，後者的中心任務是「研究」。美國二次大戰後出現的「研究型大學」就是 *multiversity* 的基本型態，今日已經是世界大學採行的制度模式。誠然，今日的「研究型大學」與蔡元培、佛蘭斯納所講的「現代大學」在基本結構與精神上是一致的，*multiversity* 則更強調大學在「教學」與「研究」(創新知識)的功能外更趨多元化。克爾《大學之功用》一書最觸動我的思維者是他點明了大學已成為「知識產業」(*knowledge industry*) 的重地！誠然，二十世紀可以說發生了一場「知識革命」(不論二十世紀發生的是科技革命或工業化[N次]革命，無不是基源於知識革命)，我們二十世紀見到的知識爆炸是人類史上前之未見的，知識是現代社會不斷發展的動力，知識力(不論是硬實力、軟實力或巧實力)已成為國力的象徵。二十世紀之所以是「美國的世紀」正因為美國擁有五十間到一百間高質素的大學(其中有五十間以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學」)。而文革十年浩劫，中國之所以瀕臨被開除「球籍」之險境，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即是中國大學的停擺與毀棄。反之，1978年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中國躍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遂而有「東升西降」之說，著名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在2011年出版的《文明》(*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中說：「西方衰退而東方崛起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教

育」。¹誠然，今日中國的大學在量與質上皆已有巨大進展，而民國時期的著名大學，如北大、清華、復旦、浙江、交通、南京等，皆已煥發新姿，躋居世界的前列大學。

1969年秋，我於匹茲堡獲博士學位後，正在原校做社會學「博士後」的研究，因當時匹大的著名的中國社會學家楊慶堃先生的大力推薦，香港中文大學的創校校長李卓敏先生到美國匹茲堡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另一位接受學位者是外交家季辛格博士〔Henry Kissinger〕）之際，當面約見我並邀請我儘早到香港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之建校工作。自此，我與香港中大結下不解之緣，直到2004年我以大學校長身分退休，前後共三十四年，退休後任榮譽社會學講座教授，迄今又二十年。事後回想，我真有幸見證並參與了香港一間偉大學府的成長與發展。

香港中大成立於1963年，創校校長李卓敏曾表明，他要建立的不是一間英國大學，也不是一間美國大學，而是一間國際性大學。事實上，李先生心目中的大學是以他任教多年的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為參照體的。柏克萊當年在美國研究型大學中居最領先，並具有現代大學新範式地位。1963年，港中大成立之時，香港的大學教育較之英美先進國家是明顯落後的，李卓敏的出現，改變了香港高等教育的生態與景觀，他在港中大設立大學本科生部門外，一早就建立大學的研究生院，他主張中、英語（文）同為大學的教學語（文），他在專業教育外，全面推展通識教育。我注意到，李校長對大學「教育」之使命，固然視為「重中之重」，而他對大學的「研究」工作的推動，亦可說是全力以赴。在大學的研究院

1. 中文版：弗格森著，黃煜文譯：《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台北：聯經出版，2012，頁395。

外，他先後設立了多個學科以及跨學科的「研究中心」。特別有意思的是，李校長在建校之初就設立「中國文化研究所」，而他自己還擔任所長多年，在這裏，我也想說李校長心中的「國際性大學」，中國文化是佔一個中心位置的。此外，李校長著力建立與教研配合的新型圖書館體系，以及與教研結合的面向世界的大學出版社等等。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李卓敏校長親撰的「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二語，實是他為港中大的學術與文化定位。

李卓敏先生於1978年自港中大退休，他自1963年創校到以後十五年的建校，遺留給港中大，以及香港的大學界一筆巨大的遺產。誠然，他開啟了此後香港的大學教育的里程碑式的新篇章。去年(2023)是港中大建校六十週年。六十年來，港中大已躍居世界大學之前茅(2023年六月春，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排名為全球四十五位，QS大學排名為全球四十七位)，不寧惟是，香港在1963年由當時的二間大學(港大與港中大)，擴展到今日十一間公私立大學，而其中包括中大的五間大學更成為世界百強之列。在世界的城市中，有如此耀眼成就者，香港恐是唯一的。過去半個世紀，不折不扣是香港的大學教育成功發展的故事。坦白說，作為一個中大人，作為一個香港人，作為一個研究大學之為大學的學人，我是頗有一份自得之心情的。

四

今年(2024)出版的《大學之理念》之「擴大版」，距1983年台灣出版同名的《大學之理念》已四十一年。而今我已是八九歲高齡之人，回憶往昔，我一生與書寫結不解緣，我的

書寫有四種，即學術書寫、時論書寫、文學（散文）書寫與書法書寫。學術書寫是我志業之所在，以研究「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為題旨，1966年出版的《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的現代化》是我第一本著作（現已有2023年香港中華書局的「擴大版」）。此後逾半個世紀，我的學術書寫的題旨始終未變，研究重點則由中國的「現代化」轉向中國的「現代性」（即中國的現代文明），先後出版了《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及《百年中國學術與文化之變》等書；而《大學之理念》與《再思大學之道》二書則亦是我「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研究的一個組成。大學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源動力；同時，大學亦是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知識基地。

今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建議將《大學之理念》與《再思大學之道》二書以上下兩卷合一出版，並仍以《大學之理念》為書名，我是欣然同意的。甘琦是卓有聲名的出版人，她對書之出版有獨到眼光，對書之品質有嚴格的要求。我是港中大退休後多年才認識甘琦這位社長的。前幾年，我有幸已有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Selected Essays on Confucianism,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 (2018) 及《有緣有幸同斯世：金耀基憶往集》(2022) 在中大出版社出版，我也體會到甘琦不一般的認真與執著的性格。她與她的高質素的編輯（們），是懷著創製一件藝術品一樣的心態出書的。所以，甘琦有意出我的書，我總是欣然同意的。當然，此書出版之際，我還要提到編輯胡召洋和特約編輯楊易韜，他們給我編輯上的意見與所付出的心力是我深切感激的。

金耀基

2024年4月15日夜

牛津版序

「什麼是大學？」這個問題，我真正認真思考是七十年代中作客劍橋大學時開始的。想必是劍橋大學古典的浪漫氣象與現代的理性精神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我從探索劍橋的歷史、文化、體制，一直探索到今日大學之源頭、流變與功能。我的探索之旅從英國劍橋延長到美國的劍橋（當時作客於麻省理工學院），還寫了《劍橋語絲》的小書。回港後不一年，1977年春被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由是更不時對書院、大學之功能與角色有所反思，就在這個時期，在理論與實踐的體認中，我對大學之理念、性格以及種種衍生的問題寫下了一系列的文字，1983年的《大學之理念》就是這些文字結集而成的。

《大學之理念》在八十、九十年代的台灣曾引起不少迴響與共鳴，它一連印了十二刷，並且在台灣的大學改革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影響，其中有幾篇文字還被有些大學指定為通識教育的讀物。中國是一個高度重視教育的國家，一個有教無類的教育家——孔子——被推崇到至聖先師的位置，這是其他文化所未有的。誠然，中國從古以來自有一套教育

制度，漢代的「太學」是當時最高的學府，直到清代仍有國子監之設，它是與漢代太學一脈相承的。但清末以還，中國的教育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1905年之「廢科舉，設學校」，是中國教育制度至為關鍵性的「現代轉向」。北京大學是中國現代型大學之開端，而北京大學之制度與精神，實是借鏡西方大學的，所以中國的現代大學是「橫向的移植」，而非「縱向的繼承」。由西方移植過來的大學，要在中國生根茁壯，無可避免地會經過一個制度建構的轉化過程，它的完善化、精緻化是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的。大學曾有人說是世上最美的一種機體，而在今日知識經濟的時代，大學作為發展知識主要的地方，已經成為社會中最重要的一種機體了。誠然，大學越變得重要，就越需要對大學之理念與功能進行反思。何謂知識？知識是否只是一種或一型？大學又是否只是求真，而與美、善無涉？不誇大地說，大學之發展方向關乎到一個國家的文明之性格。我們對大學不應採取一種狹窄之工具主義的觀點。《大學之理念》是我個人對「大學之為大學」的一些看法。當然，在書中處處透顯出我的主觀的價值傾向。

《大學之理念》原版是十七年前在台灣出版的，在這個新的牛津版本中，我刪去了原版中六篇短文，增加了四篇新的文字，我希望這個牛津版的《大學之理念》能繼續引起關心中國的大學前景的人一些思考。是為序。

2000年9月

初版自序

這是我近幾年來所寫有關大學的一個文集。

在過去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中，我不是在大學讀書，就是在大學教書，但說來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我的第一篇討論大學的文字（〈二個文化與技術人文主義〉）還是1975年在我作客劍橋時寫的，而那篇東西又是我在寫了一連串關於劍橋的感性的文字後（見拙著《劍橋語絲》）才動筆的。誠然，那篇文章確是為劍橋所觸發的。劍橋這間著名的中古大學有探索不盡的幽秘，但在捕捉欣賞她迷人的清靈之姿和夔異流俗的風格之餘，更有一種想了解她學術的內在精神和文化特性的衝動，這就是我那篇文字的來由，也因此使我第一次對「大學之為大學」這個問題作了一次較有系統性的研究。那次研究引起我對大學更多的興趣，使我接觸到紐曼、佛蘭斯納、懷海德（Alfred Whitehead）、雅士培（Karl Jaspers）、韋伯（Max Weber）、赫欽士（Robert Hutchins）、葛德諾（John Gardner）、克爾、艾雪培（Eric Ashby），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闡發大學之妙旨精義，並且影響了我對「大學」的思考。

大學之理念或大學之為大學，雖非言人人殊，但亦不是異口同調。事實上，紐曼在其傳世之作《大學之理念》中所抒發的道理與佛蘭斯納的經典巨製《大學》所論述的就大異其趣，而赫欽士的《人文的社會》(*The Learning Society*)大著中所標舉的理想與克爾的《大學之功能》(*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這本傑作中所分析的幾乎是針鋒相對。誠然，時移勢變，社會文化的變遷，就會影響到大學的位序和性質，也會改變我們對大學之期待與看法。但是，在另一方面，先賢往哲對大學所懷抱的一些基本理念，如中國「大學」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以來所建立的突出「人統」(別於「事統」與「學統」，此一看法錢穆先生有很精透的闡析)的教育理想；西方中古以來所形成的四海一家的大學之世界精神；韋伯、雅士培、蔡元培所堅執的學術與思想之自由與獨立；紐曼、赫欽士所宣揚的博雅教育；艾雪培所強調的專精知識；懷海德所珍視的想像力與實用經驗以及佛蘭斯納念茲在茲的知識之探索(研究)；葛德諾斷斷於卓越境界的論析。這些理念，無一不是今日大學的源頭活水，也無一而非繼續型塑大學性格的觀念力量。不過，歷史的流動常快過智者的洞識燭照，誠如克爾所指出，當紐曼頌揚古老的牛津之理念時，新的牛津卻正在誕生；正於佛蘭斯納宣述「現代大學」之精神時，他心目中的「現代大學」在1930年時卻已經瀕臨死亡。克爾的書則為繼而新起的大學取名為 *multiversity* (勉譯為「綜集大學」)，他說紐曼的大學是一個「村落」，佛蘭斯納的大學是一個「市鎮」，而今日他所看到的大學則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城市」。我雖然對於赫欽士描繪的大學之理念，心嚮往之，但

克爾有力的分析逼使我們用積極的眼光正視現境，瞻望將來。的確，大學像一切組織體，不可能一成不變；變是發展的契機，但成長的鎖鑰卻在變中保有不變。所有文化的成長都是承續與變遷的結合。今日的大學（或綜集大學），顯然比過去的大學有不少優勝之處，但同時也出現了種種新的問題，譬如通識教育與專精教育的孰輕孰重？教學與研究誠不可偏廢，惟應如何配合才可相輔相成？平等與卓越皆大學之所欲有，然則二者應如何始能得而兼之？大學不能為象牙塔，但是否應一意成為社會的服務站？大學應享有獨立與自由，固無可爭議，但大學是否應該或免於國家與社會的監督呢？「學統」或知性為主的大學中，人統或品性教育又應有如何的位置呢？大學不能不有相當的規模，否則不足以發揮充分的功能，但一味求大，以致體軀發達，頭腦萎縮，猶似恐龍，又是否真能有高度效能？這種種問題皆無黑白分明的答案，也因此出現了相當曖昧的局面，當然，也因此更富於挑戰性，而需要無靜止地尋求答案的智慧與勇氣。一絲不假，今日的大學正處於轉型的階段。一次大戰之後，美國在世界大學教育上，無疑地已競鞭領先，但喬頓（David S. Jordan）曾說「真正的美國大學仍在未來」。誠然，美國不少的大學大則大矣，好則好矣，但它們仍未能發展出整全的性格，仍未能為其目的與功能定性定位，其實，這在中國，在其他國家的大學又何嘗不然呢？

大學之目的與功能，儘管還未能定性定位，但有一點是十分肯定的，即大學在整個社會中的重要性已越來越顯明，用社會學家帕森斯與貝爾（Daniel Bell）的說法，大學已成為

社會的中心結構，大學教育之良窳足以影響乃至決定一個社會的文化與經濟的盛衰。不算太誇大地說，我們看一個國家的大學之質與量，幾乎就可判斷這個國家的文化質素和經濟水平，乃至可以預測這個國家在未來二、三十年中的發展潛力與遠景。就今天來看，美國與日本在大學教育上的投資是巨大的，其及於大學學齡的國民中高達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皆可接受大學教育，這是不是多少為今天美、日二國所享的世界位序提供了一個解釋？在十七、十八世紀，大學者、大思想家如史賓諾莎 (Baruch Spinoza)、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洛克 (John Locke)、萊布尼茲 (Gottfried Leibniz) 和伏爾泰 (Voltaire) 可以未入大學之門，亦不足驚怪，但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則不能不視為異數或鮮例了。可以預見，大學在發展知識與培育人才上的作用將是越來越重要的，大學無疑將在形塑、改造和推動社會上扮演一個主要的角色。亦因此，如何善用，或如何防止誤用大學應該是任何社會國家第一等的大事。

大學已變得越來越複雜，環繞著大學的問題何慮百千，我這本文集中所觸及的猶如瞎子摸象，只是一鼻一足，實不能以知全象。我只是覺得大學的重要，遂顧不得周全不周全，把自己研究和觀察所獲的一些心得，寫出來讓關心大學的人參考和指正。本書之得以出版，實是拜高信疆先生與柯元馨女士的好心催逼，理應特別誌謝。陳煥賢女士在她繁重的工作日程中更為我找資料，謄書稿，費神至多，我願借此機會致誠摯的謝意。